



刘伯承元帅的为与不为

□ 李学军

刘伯承是我军杰出的领导人，一生戎马、战功卓著，享有“军神”美誉。毛泽东评价他是“一条龙下凡”，朱德称他“具有古名将风，是不可多得的军事奇才。”陈毅也赋诗盛赞“论兵新孙吴，守土古范韩。”刘伯承不仅是军事指挥家，还是军事理论家，军事教育家，以高超的“带兵、练兵、用兵”才能为世人所称道，更以不跟风、不附势的坚强党性，不居功、不恋权、甘当孺子牛的朴实品格，不搞特殊化、夙夜在公的奉献精神，为后人所传诵。

“中国的布尔什维克”，不跟风不动摇

1911年，当武昌首义的枪声响起之际，青年刘伯承毅然选择了从军之路。他于次年考入重庆蜀军政府开办的将校学堂，毕业后到川军第5师熊克武部任职。由于足智多谋、作战勇敢，很快在军中崭露头角，成长为颇负盛名的“川中名将”，以“深思断行，独立处世”而著称。

1923年9月，刘伯承在参加讨伐北洋军阀吴佩孚的战争中右腿负重伤。在成都疗伤期间，他得以静下心来读书和思考。回首12年的戎马生涯，历经辛亥革命、护国战争、护法战争，虽立精忠报国之志，经九死一生苦战，却仍旧改变不了军阀混战、民不聊生的现状。刘伯承感到报国无门、救民无力，甚是苦恼。就在刘伯承苦闷彷徨时，邂逅了老友吴玉章，在其介绍下又认识了杨闇公。吴玉章和杨闇公是早期的共产主义活动家，当时正在成都筹备建立中国青年共产党。他们诚挚邀请刘伯承加入进来，共同致力于社会革命。令吴、杨二人没想到的是，他们的好意被刘伯承婉言拒绝了。刘伯承说：“见旗帜就拜倒，觉得太不对了。因我对于各派都没有十分的研究，正拟极力研究，将来始能定其方道。”接下来的日子里，他除了将各种主义、学说进行对比外，还随吴玉章到北京、上海、广州等地实地考察共产主义运动。在北京与中共北方局负责人赵世炎谈话，在上海亲历共产党领导的“五卅”运动，在广州目睹省港大罢工……两年多的求索，一路的所见所闻，让刘伯承深切地认识到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拯

救中国，于是于1926年5月毅然加入中国共产党，踏上了新的革命征程。

刘伯承入党后，终其一生都保持着当初参加革命的理想。50岁那年，他在所作的《自铭》中说：“如果我一旦死了，能在我的墓碑上题上‘中国布尔什维克刘伯承之墓’十二个字，那就是我最大的光荣。”

甘当普通革命军人，不居功不图名

几十年的革命生涯中，面对自己率领部队打下的一个又一个的胜仗、立下的一个又一个战功，刘伯承始终保持谦虚谨慎的态度，从不邀功请赏，更不居功自傲。

解放战争初期，国民党郑州绥靖公署调集三路大军，分别向嘉祥、巨野、濮阳进攻，企图围歼冀鲁豫野战军于鲁西南地区。刘邓率领晋冀鲁豫野战军依据避强击弱原则，立即向濮阳转移。转移途中，获悉国民党军一部由菏泽向鄆城孤军冒进，刘伯承遂当机立断，发起并亲自指挥了鄆城战役，在鄆城以南地区歼敌9000余人。随后又指挥了历时4天的滑县战役，歼灭国民党军第104旅、保安第12纵队全部及第125旅大部共11800人，彻底粉碎了蒋介石欲打通平汉线占领邯郸的美梦。但在总结这两次战役的成功经验时，刘伯承反复强调：“我们的胜利是在党中央、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取得的……我们正是因为坚决执行了党中央、毛主席的指示，才取得了消灭敌人四个半旅的胜利。”充分显示了刘伯承淡泊名利的高尚境界。

刘伯承用兵如神、屡战屡胜的故事，在中原大地不胫而走。1947年6月8日，晋冀鲁豫野战军在安阳召开了庆功大会，解放区党政军群各界派出代表送给刘伯承一面绣有“常胜将军”四个大字的横匾。刘伯承婉言谢绝了这块横匾，谦虚地说：“说我是常胜将军，我不敢当。不会是常胜，多数胜就不错了。在毛主席、朱总司令的领导下，在后方人民的帮助下，我们尽了自己的责任，我只是人民的勤务员。是党的功，人民的功，我不敢‘贪天之功’，没有人民给吃、给穿，军队就不能打仗。”

上世纪50年代初期，苏联编写《大百科全书》，在“刘伯承”条目

下这样写道：“刘伯承，四川开县人，革命军事家……”当有关部门拿着初稿去征询刘伯承的意见时，他拿起笔，毫不犹豫地把“革命军事家”改成“革命军人”。刘伯承说：“不要说自己是军事家，我们都是毛主席军事思想指导下，才打了胜仗的，是靠了许多革命军人英勇奋斗才取得胜利的。我只是一个普通的革命军人。”

主动请缨创办军校，不揽权不恋位

刘伯承受人钦佩和爱戴，不仅因为他在战场上神机妙算、战功卓著，而且因为他不揽权、不恋位，扑下身子办实事，为我军的正规化建设做出了突出贡献。

刘伯承毕业于苏联伏龙芝军校，是“科班出身”的元帅，

一直关注部队军事人才的培养和正规化建设。他在红军时间就担任过红军大学的校长，1946年又在频繁的战事间隙，补译、校订《合同战术》一书，思考我军现代化、正规化建设问题。1950年6月，在得知中央军委决定建设陆军大学的消息后，刘伯承基于“建军必建校”“治军必先治校”的认识，主动给中央写信，言辞恳切地要求辞去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和第二野战军司令员的职务，自告奋勇去办军校。毛泽东被他的真诚所感动，同意了他的请求。就这样，刘伯承担负起了创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的重任。

为完成好中央军委赋予办学的光荣任务，花甲之年的刘伯承以“昼夜不息”的精神，带头学习，勤奋工作，制军语、译外文、校条令、写教材、上大课。在刘伯承的不懈努力下，军事学院的专业设置和课程建设日臻完善，使刚从战场上成长起来的“泥腿子”将军得到了正规军事课程的淬炼，为新生的共和国培养了一批又一批既有实战经验又富理论素养的德才兼备的高、中级指挥员和参谋人员，为我军的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



刘伯承元帅



1946年11月12日，刘伯承（左）、李达（右）接见被俘虏的敌军104旅旅长杨显明（中）等



1951年1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正式成立，刘伯承院长主持了成立典礼

全面从严治军的稳固基石：共同条令

□ 冯定汉 刘德广

共同条令在我军建设发展史上发挥了重要作用。治军先治典。我军极为重视共同条令的制定和修订工作，早在红军初创时期，毛泽东同志就亲自制定了《三大纪律、六项注意》（后改为《三大纪律、八项注意》）。1930年10月，我军第一部纪律条令——《中国工农红军纪律条例草案》正式颁布施行。1933年8月，中国工农红军颁布了《纪律暂行条令》。1936年8月，红军到达了陕北，为进一步巩固部队，做好迎接新的斗争准备，制定发布我军第一部内务条令，即《中国工农红军暂行内务条令》。抗日战争期间，我军于1939年5月、1942年2月、1943年10月先后三次修订和颁发《纪律条例》或《纪律条令》，对严明军纪、严明赏罚，保证作战任务的胜利完成发挥了重大作用。新中国成立后，我军从战争环境进入和平建设时期，加强正规化建设迫切需要健全完善法规制度。1951年1月，中央人民政府革命军事委员会同时颁布《内务条令》《纪律条令》《队列条令》，从此我军形成了完整的共同条令体系。20世纪50年代到90年代，我军共修订和颁发共同条令8次，内容也日渐完善。进入新世纪，根据中央军委的决定，我军于2002年对《内务条令》《纪律条令》做了局部修改，于2010年对《内务条令》《纪律条令》《队列条令》作了全面修改，对加速推进军队正规化建设起到了很好的促进作用。

新时代强军兴军迫切需要修订共同条令。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主席总揽全



军队建设

让科技创新点亮强军之路

□ 张风坡

习近平主席出席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解放军和武警部队代表团全体会议时强调，要加强国防科技创新，加快建设军民融合创新体系，大力提高国防科技自主创新能力，加大先进科技成果转化运用力度，推动我军建设向质量效能型和科技密集型转变。随着信息化作战样式的深度发展，科技在军事活动中的优势越来越凸显，全面建成世界一流军队，实现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很大程度上依靠国防军工战线的科技创新。

近30年来，世界发生的几场大规模战争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科学技术在作战中的运用越来越普遍，无论是集团作战还是小股袭扰，科技手段在交战、对峙中的决定性因素十分明显。我军着眼世界军事变革和未来作战样式需要，牢固树立科技是核心战斗力的指导思想，积极推动科技创新、自主创新，加快推进战略性、前沿性、颠覆性国防技术发展，大大提高了科技创新对人民军队建设和战斗力发展的贡献率。国际舆论普遍认为，科技创新正在成为中国军队问鼎世界一流军队的重要战略选择。

人民军队的发展史就是一部科技创新史，军事工业在科技创新的征程中留下了浓墨重彩。近代以后，由于国内外各种原因，我国屡



次与科技革命失之交臂，从世界强国变为任人欺凌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我们的民族经历了一个多世纪列强侵略、战乱不止、社会动荡、人民流离失所的深重苦难。新中国成立后，党中央、中央军委多次发出加快发展国防科技的指示，一大批军工工人潜心科研，不辱使命，为国防科技做出了杰出贡献。氢弹元勋于敏，受命后在长达28年的时间里隐姓埋名搞研究，凭借“板凳甘坐十年冷”的专注和“咬定青山不放松”的韧劲，攻克了数不清的氢弹制造原理，成为我国“氢弹之父”。“两弹一星”元勋、著名的导弹和火箭专家任新民，从东风一号导弹到长征三号运载火箭，从放飞东方红一号卫星到担任载人航



天工程首席顾问，即使年过百岁也从未离开过中国航天事业的视线。去年，我国第一艘国产航母顺利下水，多用途无人机“翼龙”一飞冲天，空警—500预警机精彩亮相，沙场阅兵国产装备密集呈现……在一代代军工工人的接力下，军工企业创造出“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的国防科技创新奇迹。实现人民军队跨越式发展，国防科技必须实现由跟跑、并跑到领跑的发展目标。由于军事强国的技术保护思维，我国的国防科技长期在摸索中艰难前行，在自主创新中发展。军工人并没有在困难面前畏惧退缩，而是始终怀着必胜的信心和决心，攻克了一道又一道技术难关，让我国的国防科技日新月异，

为人民军队的战斗力跃升增添了虎之两翼、鹰之两翅。

战争作为一种武力手段，始终对先进科技有一种特殊的偏爱。谁占领了科技优势，谁就能掌握军事竞争主动权；谁忽视了科技进步，谁就会陷入落后挨打的被动局面。在奔向强军目标的征程中，军工战线的科技创新无疑是一盏耀眼的明灯。

